习近平讲话的语言风格及特点

说话，既是一种思想观点和能力水平的展现，也是一种领导艺术和技巧的反映，同时也是一个人立场、态度、方法和感情的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善于用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同频共振、凝聚共识；善于用大白话、大实话和群众语言深入浅出、解惑释疑；善于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娓娓道来、触及心灵；善于用极其凝炼、高度概括的话语提纲挈领、大开大合；善于用问题开刀，拿现象作靶开诚布公、振聋发聩；善于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广征博引、纵横捭阖；善于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大情怀、展现真性情；善于用可亲可敬、平易和蔼又从容淡定、沉稳大气的肢体语言和语态眉宇传神、灵动善融。这种语言风格和特点，充满吸引力、感染力、感召力，对纠正领导干部讲话中的假、空、长等不良风气，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 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大大小小百余次重要讲话，包括大量的批示、演讲、访谈和信件等，形成了其独特的富有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充满了语言魅力。这些讲话让大家想听、爱听、愿听，往往觉得很过瘾、很解渴、很兴奋，常常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和醍醐灌顶之感，许多话题被热议，许多语录成热词，许多观点成了听得进、记得住、传得开、用得上的经典和名言警句，既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又有很强的穿透力和冲击力；既娓娓道来、和风细雨，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真正能入耳入脑入心入神。

探究和总结习近平讲话的语言风格，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那次讲话初见端倪，那篇演讲可谓语惊四座，又波澜不惊，字字句句叩击着心灵，显现出一种自信大气、从容淡定、沉着稳健、朴实平和的风格特点，之后的一系列讲话特别是出访国外的多次演讲、考察工作时的多次讲话，以及在纪检、组织、思想宣传、外交等诸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集中展现了他鲜明的话风和语言特点。这里，专就其讲话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作一初步且粗浅的梳理，乃管中之见，难免挂一漏万，以期抛砖引玉。

善于用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同频共振、凝聚共识。让故事来讲理，让事实来说话，让事例来说明，这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经常运用，尤其是他在国外的多次演讲，都会讲一些故事，或者举一些具体事例。比如，他在莫斯科的演讲中，生动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等三个说明“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事例”；在坦桑尼亚演讲时，讲了一对中国年轻人如何热爱非洲的故事，在讲到中非关系和中非人民越走越近时，列举了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以寻常百姓生活的共同点，瞬间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在刚果演讲时，讲述了三位中国华侨冒险救出12名刚果邻居的感人事迹；在墨西哥演讲时，用米卢带领中国足球闯进世界杯比赛和墨西哥跳水队在中国教练指导下拿下好成绩的事例阐述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时，讲述了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创作的故事，特别是他讲述的中哈两国人民交往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半世纪后儿子找母亲，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留学生无偿献血，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等等。这些故事和事例生动有趣、鲜活实在，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巨大的宣传效应，从这些故事和事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得到启迪。在国内的一些重要讲话中，他也常常“举例说明”，比如列举过秦王朝、唐王朝由兴到衰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讲“颜色革命”的事实来说明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道理；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来告诉大家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等等。事实胜于雄辩，故事和事例是有血有肉的，它胜于一切空洞无物的说教，很多道理在事实面前不言自明，很多歪理在一个个事例面前不攻自破，这就是讲故事的魅力。

善于用大白话、大实话和群众语言深入浅出、解惑释疑。大家普遍感到，习总书记讲话最鲜明的一个语言特色是口语化、接地气。他经常用一些很直朴、很简单的大白话、大实话，特别是一些普通干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话来表达思想，包括还经常会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歇后语、网络用语，会用一些形象化的比喻，等等，这样的大白话俯拾皆是。比如，他用“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样朴实无华的话来阐明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用“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来比喻说明只有经济总量而没有先进科学技术支撑是不够的；用“益智补脑”来比喻学习；用“缺钙”“软骨病”来比喻理想信念的缺失；用“玻璃门”“弹簧门”来形容阻碍民间投资的体制障碍；用“墙头草”“推拉门”来描述干部队伍中的好人主义，等等。他讲改革要辩证施治，“既要养血润燥、化瘀化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讲树典型不能用“开小灶”“吃偏饭”的方式来催生；讲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鞋子合不合适，自己穿了才合适”。甚至像当年毛泽东说有新闻也还有旧闻的句式，他提出，“‘一般’如果没有硬杠杠，最后都成了‘二般’了”。他讲，“我们手里捏着一把好牌，一定要有好牌打成为好局的自信”。他还讲，“做群众工作，我们共产党本来就是拿手的”。类似“一把好牌”“拿手的”这样极具口头语的用词和表达，远比那些“打磨”过后工工整整的大话更生动活泼，更具生活气息。这些很接地气的群众语言，轻松自然、通俗易懂，口语化味道很浓，它一扫人们反感的大话、套话、空话和“官话”，与大众话语体系很对接、很吻合，似春水一般清澈，令人耳目一新。习总书记在讲到中国梦时指出，“中国梦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是一个最大公约数，是一种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表达”。而他讲话的语言风格正是在以“一种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表达”为显著特征。

善于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娓娓道来、触及心灵。习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但不居高临下，他经常用一些近乎唠嗑、拉家常似的聊天、谈心式话语触及人的心灵，话语中充满着亲和、温和、随和，以及平等、平易、平实的风格特点，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让人倍感亲切、温暖和感动，不经意中感化人、教育人和引导人。比如，令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一开口就说“让大家久等了”，接下来又说“大家很敬业、很专业、很辛苦”，言语中一股理解人、关心人的暖流悄然涌动，浸润心田。在这篇精彩的讲话中，他还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公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样的语言没有高调和口号，也没有任何豪言壮语，而是一种近乎谈心式沟通交流，沐浴着人的心灵。他在坦桑尼亚演讲时，一开口用“哈巴里”打招呼，用“阿桑特民萨那”来谢谢大家。他在墨西哥演讲时，还深情地道白：“我是一个足球迷。”等等，处处尽现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亲民风彩。特别是总书记在每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时，经常用自己亲身经历和切实感受来促膝谈心，说真话、实话、心里话，说管用的话。比如，他关于要求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系列讲话，都不是板着脸孔、硬邦邦地说话，而是言传身教，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示之以行。他曾讲自己在福建宁德当地委书记时为何不住窗式空调房间而住在居民区里，为何一直不敢带头装空调，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时如何用车，以此告诫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在福州工作期间如何“坚壁清野”拒收购物卡等礼品，以此引导领导干部拒腐蚀永不沾；外出调研如何避免“扰民”、不搞特殊化，以此教育领导干部要跟群众多零距离接触，多打成一片，不做群众反感的事，等等。他还语重心长地要求领导干部“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省下点时间，多读点书，多思考问题，油腻的食物少吃一点对身体还是有好处”。这样的话语既如长辈，又似邻家兄长，让人如沐春风，心有所动。

善于用极其凝炼、高度概括的话语提纲挈领、大开大合。总书记的讲话站位高、立意高，思想深邃、思路开阔，既有很强的气场，又有很大的气势，这种气势首先表现在语言气势上，他面对广大青年阐述中国梦时大开大合地讲到，“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这种气势又往往贯穿于时空上的大跨越、大穿越。比如，对500年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他用“6个时间段”进行高度概括；对党走过的92年光辉历程，高度概括为“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3件大事”，并得出结论，我们脚下的这条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走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中“走出来的”，是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走出来的”，是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传承中“走出来的”。这四个“走出来的”由近及远，不断上溯，上下几千年，时空大纵横。又比如，他在参加“复兴之路”展览时，把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明天用三句诗词作了高度凝炼的描述和概括，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大气磅礴、气势恢宏。这种气势还常常体现在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揭示、把握上，比如，他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的30多年，大体每10年是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又有一个共同特点：开头都充满机遇挑战或危机，之后又转危为安，这就是对规律的总结。他还善于用一些高度凝炼的几个字或关键词，把思想浓缩其中，让人能听懂、能明白、能记住。比如，他在讲到中非关系时，用了“真、实、亲、诚”四个字高度概括，精辟而深刻。总书记的讲话，总是以这种凝炼、归纳和概括的大手笔，高屋建瓴，有很强的历史纵横感和现实深邃感。

善于用问题开刀，拿现象作靶开诚布公、振聋发聩。总书记的讲话为什么很解渴、很过瘾，总会引起强烈共鸣，产生巨大反响，甚至让人拍案叫绝？关键在于了解实际、深谙国情党情民情，实事求是地讲问题、摆现象，敢于亮剑、敢于“唱黑脸”。在总书记的讲话中，问题始终是个导向、是号角，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针见血、有的放矢。比如，他经常列举干部队伍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可谓毫不留情；他讲到现在社会上浪费现象以及奢靡、奢华之风很甚，可谓痛心疾首；讲到一些干部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严重，可谓直指病根；特别是他对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的诸多表现、干部队伍好人主义、不敢担当的种种样子，包括用人上的种种“关系圈”“潜规则”等不正之风、年轻干部成长过程中的不良习气，甚至社会上的种种假丑恶现象，等等，都拿起手术刀，剖析得鞭辟入里，不回避矛盾和问题，不隔靴抓痒隔山打牛，这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气魄，使得每一次讲话都有大喝一声、猛击一掌的感觉，使大家更好地“照镜子、正衣冠”。

善于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广征博引、纵横捭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它山之石为我用，这在总书记的讲话中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特别是对于古今中外一些经典的古诗词运用堪称驾轻就熟、画龙点睛。他用著名学者王国维关于治学的三种境界来论述理论学习也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有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也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人憔悴”的心甘情愿；更要有“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在“灯火阑珊处”去领悟真谛。这种语言比一般地提学习要求更妙趣横生、意味深长。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几乎在他的讲话中都会时不时地引用一些古今中外的格言、警句、古语和诗词，即使到国外的一些演讲，也都顺手拈来、恰到好处，为每一次讲话增色不少。这种广征博引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正如总书记所说，是“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珍贵滋养，从人类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中寻找登高望远的思想阶梯”。

善于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大情怀、展现真性情。无情未必真英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任何一个讲话或一篇文稿，高低深浅在于字里行间有没有流淌着一种真情实感，无论是个人情感抑或是家国情怀，有了感情在里面跃动，语言文字也就活了起来，就会充满了灵气，有了一种“会说话”的生命力量。总书记常常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内心汹涌澎湃的家国情怀，他号召“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他曾感慨到：“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他还曾饱含深情地谈到“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炊烟”，多么有诗一般的画面感啊？他也曾用诗一般的语言告诉人家，“当我透过飞机舷窗俯瞰浩瀚的太平洋时，仿佛看见几个世纪前那些满载丝绸、瓷器的‘中国之船’正向着阿卡普尔科破浪前行；当我踏上贵国的土地时，又仿佛看见那位传说中的乐善好施的美丽的‘中国姑娘’正在普拉埃布传授纺织、刺绣技术”，等等。这么富有诗情画意般的语言是因为“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想起当年的事情，触景生情，感慨良多”，是因为心中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是因为心中那片赤子情怀、家国情怀。

善于用可亲可敬、平易和蔼又从容淡定、沉稳大气的肢体语言和语态眉宇传神、灵动善融。肢体语言是语言的组成部分，习总书记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表情，使他的讲话更多了一份亲和力和感染力；他打着雨伞，卷起湿漉的裤腿，雨中视察工作的神情，更平添了他忘我敬业、勤勉克己的人格魅力；他不封路、不封园、不扰民的种种举动，让他爱民如子、与民水乳交融的形象大放异彩，特别是在与普通群众的交流中，他笑呵呵的一句“你比我大，我叫你大姐”温暖无数人的心，他对不认识自己的农家妇微笑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等等，这种不摆架子、不作秀，亲切、宽厚、融洽、随性，与民共融互动，言行举止可谓眉宇传神、灵动善融；然而面对那些不正之风、假丑恶现象，他也义正辞严，不怒自威。语言风格还包括语音语调、语气语速和语神语态等，习总书记的讲话有特殊的节奏美、韵律感，时而河水潺潺，时而深沉似海；时而和风细雨，时而铿锵有力，稳而不停、沉而不涩、缓而不滞、平而不淡，其眉宇眼神成了表达思想的有效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就一些干部不会说话而批评道：他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说话，既是一种思想观点和能力水平的展现，也是一种领导艺术和技巧的反映，同时也是一个人立场、态度、方法和感情的表达。学习总书记讲话的语言风格和特点，更加增添语言魅力，避免当年毛泽东所说的“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让自己的讲话真正说得上去、说得下去、说得进去，增强讲话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感召力。

六大变化看三中全会新的改革路线

□冯建波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不仅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也再次激发了全体人民对改革、对未来的信心。从《决定》内容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既延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和邓小平始终强调的改革精神，又在新的实践中对改革的目标和理念有了新的创新，具体可从“六大变化”来看。

从“量的改革”到“质的改革”。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改革，除了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其余的历次改革基本是单项性的改革，不少只是关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比重的调整，也就是说基本上属于“量”方面的改革，对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导致产生一方面只要遇到困难和问题，都把原因归结为“体制”问题，另一方面却在“体制”改革上进展不快。这是因为体制性的改革涉及多方利益的调整，而既得利益又千方百计地阻碍这种利益结构的调整，所以尽管一段时间社会上改革呼声很强烈，但改革阻力重重。《决定》全文公布后，不少人都大呼意外，没有想到这次改革的力度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措施如此之细，普遍认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从“摸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摸石头过河”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是中国改革初期一种“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冲破改革各种束缚、最终夺取胜利的方法，但“量变”最终是为“质变”作准备的，随着改革经验的不断丰富，以及改革成果的不断积累，必须要通过“质变”，实现大的跨越和质的飞跃，但这种跨越和飞跃，仅仅停留在经济基础的层面已经远远不够。尽管“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样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在此过程中保持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但如果没有上层建筑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动适应经济基础，改革有可能演变成革命，并引发社会的动荡，这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摸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自信与自觉，这也是“三个自信”的必然要求和充分体现，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从“生存倒逼”到“社会倒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起点都是由于各种生存问题“倒逼”所致：70年代末以农村联产承包开始的改革，是因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再不改革，饭都没得吃了；国有企业改革，是因为当时政府财政处于“揭不开锅”的困难局面，政府出现了生存危机，只能通过“摔包袱”形式把国企推向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是因为中国面临国际巨大压力，国家处于“不进则退”的境地，必须通过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求得生存与发展；本世纪初的改革，是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规则“倒逼”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家财政境况的好转，生存倒逼改革的情况不再，导致主动改革的内在动力有所减退，改革甚至成为垄断部门等利益集团维持既得利益的手段和借口。与此同时，社会层面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让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要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全面深化包括企业、金融、教育、改革、政治领域等各项体制的改革，并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共识，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社会上提出的各种改革建议和方案作出了全面回应，正视和关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集中了全党全国的改革智慧，体现了群众路线。

从“政府强干预”到“市场决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政府调控市场、市场调节企业，一直是政府与市场的主要关系，尽管市场机制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使得我国的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政府立即强势介入干预，几次的调控政策无不反映了这种强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投入，并使凯恩斯主义奉为当时政策的理论依据，当然，4万亿元是值得肯定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强干预，已经被美国所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它是滞胀的祸首。而中国虽然暂时摆脱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接下去一些省份却过高预期了政府干预的作用，掀起了新一轮政府投资的热潮，最近几年各省出台的投资方案，几乎都是上万亿元的规模，把政府投资看作是拉动GDP的万能钥匙，甚至有收不住的趋势。与宏观层面一片繁荣景象相反，微观层面危机暗涌，企业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实体经济竞争压力增大，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怎么办？必须要重新回归市场化的轨道，让市场机制重新在中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微观层面的活动，回归本职——制定规则、规范竞争、维持秩序、保障民生，政府不能包罗万象，而是“有限政府”，赚钱的事要让民间和企业去做，而且民间和企业会比政府做得更好。

从“管理”到“治理”。在传统的思维中，国家作为专政的机器，一直担负着“管理者”的角色，政治体制如何推进，一直没有摆脱“管”的定式，考虑的都是如何管钱、管物、管事、管人的问题，每每遇到要做一件事，先考虑如何设一个“管”的部门，下级要管，企业要管，社会要管，“管”的事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庞大，但事却没有真正管好，机构之间职责不清，遇事相互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下，“四风”问题突出，群众意见较大。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设定意义非凡。什么是“治理”？“治理”有别于“管理”，“管理”强调的是“控制”，对下级部门的控制、对人财物的控制、对过程的控制，等等，而“治理”则更加强调体制机制的“构架”，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安排，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权力设置和权力安排，形成目标一致的合力，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治理”是通过对权力部门的“确权”来实现的，通过“确权”形成权力机关的法权关系，三中全会通过制度性设计安排，对国家权力机构各方面都进行了“确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从“放权让利”到“公平正义”。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控制全部社会资源，集中几乎全部的社会权力和财力，因此“放权让利”一直是前35年改革开放的主基调，但“放权让利”也让改革陷入了“放了收”“收了放”的怪圈，并逐步产生了对权力和财力的垄断，造成了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现象，分配关系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并由此产生了各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看，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如以往般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一次发放“全民福利”的改革，以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为立足点、出发点，通过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使改革的成果让全民共享，特别是让劳动者享有劳动的尊严和劳动的成果，无疑有利于纠正社会上拜金、物欲现象和浮躁心态，高扬起“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旗帜。

当前，中央的改革决心和措施已经非常明确，关键还要靠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只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用“一分靠部署，九分靠落实”的精神状态，积极承担起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三中全会确定的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优越性。